

大师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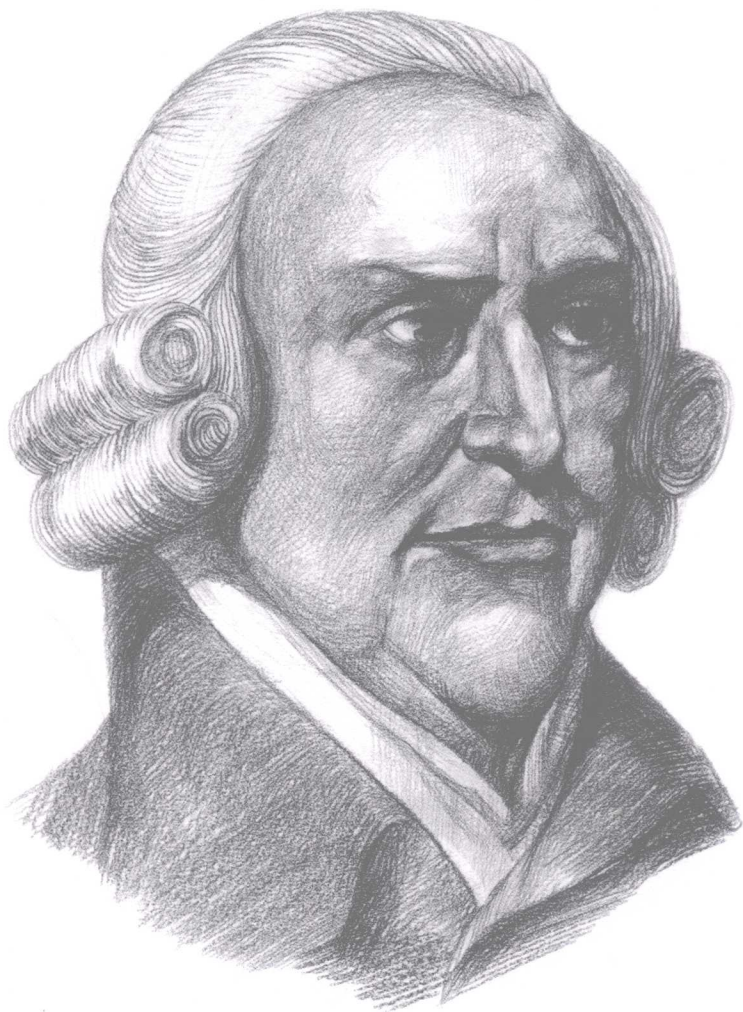
经典通读
第二辑

通俗阅读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道德情操论

求富有道即合德



(英) 亚当·斯密 著

何丽君 编译

北京出版社



道德情操论

Adam Smith

(英) 亚当·斯密 著

何丽君 编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情操论 / (英) 亚当·斯密 (Smith, A.) 著; 何丽君
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9

(经典通读)

ISBN 978 - 7 - 200 - 07303 - 4

I. 道… II. ①亚…②何… III. 伦理学—思想史—英国
IV. B82 - 09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907 号

经典通读 第二辑

道德情操论

DAODE QINGCAO LUN

(英) 亚当·斯密 著

何丽君 编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集 团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发行

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2 印张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303 - 4/G · 3710

定价: 23. 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63973790 010 - 58572393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出版一年了，20册经过全新编译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美者有之——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了解西方的文化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批判者亦有之——不是大师原著，读来何用？警惕快餐文化向学术圈进逼！

回忆丛书策划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休谟、康德、马克思、牛顿、达尔文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师的无限敬畏，以及对其伟大著作的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无比难堪，可以说《经典通读》丛书实现了“大师经典，通俗阅读”的出版目的，完成了把艰涩难懂、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转化为普惠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10万字左右的通俗读本，有多少人会真的捧起《政治学》、《政府论》、《资本论》、《人性论》、《战争论》、《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相对论》……并能坚持读完？这就是《经典通读》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套20册的学术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累计销售30多万册的原因。

可以说学界对《经典通读》的出版是宽容和肯定的，大多



数专家学者开始明白，学术经典不该只是象牙塔中供少数知识精英把玩的古董，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精髓，应该发挥其“以文化人”的作用，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经典，了解这些经典，汲取人类先贤们的文化营养，分享人类思想的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济喜认为，研读西方经典，对于提高国人素质是必要的。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知识的通俗化，《三字经》、《千字文》就是经典通俗化的代表。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通俗的编译本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就坚持阅读品位、坚持图书导向来说，这套《经典通读》丛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著名经济学家邢国均研究员说：当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很普遍。比如经济学研究者可能希望了解一些哲学理论。而有些著作往往篇幅过长，且理论艰深、晦涩难读。如果有可靠的普及本，读者就可以对原著有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和初步的了解。另外，对于初次接触某一新的知识领域的读者来说，对某些理论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有把握，通读本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参照编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把握这些理论。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的加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经典通读》这样的丛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桢教授还就国学热背景下的西方经典阅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国学与西学相互碰撞的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其实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人自信心增强的表现。以前我们看西学可能是仰视，现在可能就是平视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将西学名著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国学家都是中西贯通的大家。如著名的清华大学“国学四导师”，他们除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都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今天研究国学，也要懂得西学。

正如在《经典通读》第一辑的《编者的话》里写到的，“与世界接轨”，首先就该“让思想先行”。除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对西方经典文化也应积极推广。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传

播中的壁垒——几十万上百万字的沉重篇幅，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要做到这点，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关键。换言之，再好的著作，读的人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受到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 100 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也纷纷进行深度报道，其中人民网还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读者调查，让大家发表对这套书的看法。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广大读者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认为这是能让他们阅读这些经典的最好办法。而在全国掀起的明星代言《经典通读》活动更是引起舆论关注，众多媒体以大幅版面介绍本丛书和大家投票选出的代言明星。明星与经典学术著作的强烈反差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策划《经典通读》丛书的初衷。当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票选名列前茅的杨澜时，她表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人文著作，要看它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去推荐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吸引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对推广文化也是很好的事情。

几千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名著浩如烟海，与第一辑的 20 册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很多。受到第一辑成功的鼓舞，今天我们又推出了《经典通读》第二辑，使丛书的总册数达到 40 册，涵盖的作者和门类更加齐全和有代表性。

在第一辑中，马克思揭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用《资本论》缔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探索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创立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伟大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注定成为人类挑战宇宙的旗帜！

在第二辑中，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通过自己的《沉思录》，解析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使领袖和平民都成为他的读者；卢梭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认为人生来自由、平等，人人都应享受这一天赋的权利，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爱弥



儿》；亚当·斯密期望人类有冷静慎思的能力，而不仅仅受自利的驱动，于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道德情操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经典通读》第二辑仍然秉承第一辑的出版原则，完全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将经典大部头进行瘦身，力求提炼出原著精华，在原汁原味中化繁为简地通俗解读大师们的著作。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能满足大家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有“替代”原著的作用；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的作用，真正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的大门。

同第一辑一样，《经典通读》第二辑的编译者也均为年轻的学者。他们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并且所编译的著作都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就避免了已往有些编译者只懂外语而不懂专业所造成的译稿不准确、不通畅等问题。或许有人质疑年轻人的功底，其实，这些人往往只注意功成名就者的成果，而忽略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只要他们有披荆斩棘的勇力，梳理芜杂、条分缕析的细致与耐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期望中的经典。请别忘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时年龄不过24岁。

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想重申《经典通读》第一辑《编者的话》中的观点：“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是我们的理想，但要真正实现难度却很大。但愿第二辑做得比第一辑好些。不当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批评赐教。

石岱峰

2008年9月

求富有道即合德

——《道德情操论》导读

亚当·斯密不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的两部传世名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分别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代表作。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坚持，受利己心激励的理性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往往会同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因而应当允许每个人在正义的法律约束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从道德心理学角度，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人的自爱动机天然地受到“同情”机制的平衡和制约，从而使人的求利激情得到抑制和缓和，使人的逐利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和正义的基本要求，“求富有道”也就达到了基本的美德标准，因而《道德情操论》对人的行为动机的探索，实际上是对“理性经济人”行为的道德约束机制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理性经济人”的求利行为寻求道德基础或者说进行伦理上的辩护。据此，我们认为，尽管《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各有所侧重，但其精神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因而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实际上不称其为真正的问题。





亚当·斯密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的柯卡尔迪。父亲做过律师，并担任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城的海关监察，母亲是当地一位大地主的女儿。在亚当·斯密出生前6个月，父亲去世。亚当·斯密无兄弟姐妹，与母亲相依为命。

孩提时代的亚当·斯密体格瘦弱，性格怪僻，经常独自出神，据说还有自言自语的习惯。也许，性格决定命运。能够摒弃外界干扰进行独立思考的习惯，有助于亚当·斯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事物进行抽象的逻辑思辨，从而写就影响深远的鸿篇巨制《国富论》。然而，也正是这种“独自出神”的性格，使现实生活中的亚当·斯密略显木讷。亚当·斯密4岁时，在一次前往外祖父家的路上被一群吉普赛人诱拐，后经母亲及时追赶方才脱险。亚当·斯密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该校学士学位，但毕业生名册上竟没有他的名字，对此亚当·斯密也不追究。

1737年，14岁的亚当·斯密在当地读完中学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攻读道德哲学。在此期间，亚当·斯密与当时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著名道德哲学家哈奇森结识，并接受其影响。由于成绩优秀，亚当·斯密于1740年被举荐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深造。据亚当·斯密自己追述，在牛津的学习生涯对他后来的毕生事业没有多少影响，但不可否认，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亚当·斯密的研究视野。另外，在牛津期间，亚当·斯密在哈奇森介绍下与哲学家大卫·休谟结识，并认真研读休谟的《人性论》。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不久，亚当·斯密进入爱丁堡大学任教，与休谟过从甚密，结下终生友谊。1751年，亚当·斯密进入格

格拉斯哥大学，先任逻辑学教授，后接替哈奇森成为道德哲学教授。在他所讲授的道德哲学中，包含了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初步思想。1759年，《道德情操论》一书出版，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亚当·斯密与发明家瓦特交往，支持瓦特的科学实验活动。

1764年，亚当·斯密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应邀担任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之子的私人教师，并于1764年至1766年间陪同他的学生游历法国和瑞士。法国是当时欧洲大陆最发达的国家，在法国的游历，使亚当·斯密有机会详细考察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并能够同杜尔哥、达朗贝尔、魁奈等法国一流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其中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对亚当·斯密有很大的影响。

1767年，亚当·斯密辞去家庭教师工作，回到故乡，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历时六年，亚当·斯密完成了《国富论》初稿，随即拿到伦敦出版。在伦敦，亚当·斯密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对《国富论》进行修订，又历时三年，1776年该书正式出版。

《国富论》一经出版便备受推崇，迅速被译成几国文字，在欧洲及美洲大陆广为流传，一些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参考《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亚当·斯密本人也声名远扬，荣誉和头衔接踵而来，当时英国的许多政界要人都以作亚当·斯密的弟子为荣。1778年亚当·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爱丁堡海关税务部长，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成名后的亚当·斯密并没有停止研究和著述活动，他在工作之余涉猎新的研究课题，并不断修订《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使之更加完善。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溘然长逝，走完光荣而非凡的一生。亚当·斯密一生治学严谨，临终前要求亲友把他自认为不适合发表的手稿付之一炬。亚当·斯密终生未娶，没有子女。人们在清点他的遗产时发现，他把大部分的收入秘密地用于社会



慈善事业。亚当·斯密用自己默默的行动诠释了他笔下“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在暗示后人要正确解释他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



《道德情操论》共七卷，每卷有一至四篇不等，主要论题依次为：行为的合宜性，优点和缺点，正义和仁慈，良心和责任感，效用与美，道德与风习，个人品质，诸种道德哲学体系等。该书是英国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对沙夫茨贝利、哈奇森、休谟等人的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在继承和发展其老师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学说的基础上，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包括“公正的旁观者”说和“良心论”的道德评价论，以及以审慎、仁慈、正义、自制为主的德性论。

“同情”（sympathy）是亚当·斯密道德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亚当·斯密的“同情”概念直接来源于休谟的“同情”学说。休谟认为同情别人是人性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经过传达而接受别人的心理倾向和情绪。休谟的“同情”，实际上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和情感的相互感应，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情感必然要做出的情感反应，因此有“共感”、“共鸣”的意思，有别于“怜悯”（pity）。在休谟看来，同情的作用是使人们的情感相互接近，克服其相对的一面，从而使普遍一致的道德倾向成为可能。

亚当·斯密认为，不论一个人多么自私，在他的本性中都明显存在着某种关心别人命运和幸福的情感。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者以生动的方式想象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生的感情。我们常悲人之所悲，哀人之所哀，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无须什么例证。亚当·斯密认为，这种情感和人性中的其他原始情感一样，无论是高尚之士，还是奸恶之徒，人人皆有，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过，亚当·斯密也指出，“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而他所用“同情”一词是广义的，它不仅是指对他人不幸的同情，而且也包括对别人的快乐和幸福的同感，用亚当·斯密的话说，我们不妨用它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从亚当·斯密对“同情”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的“同情”与休谟的“同情”意思相近，指的是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想象当事人所经历的事件或境况，从而产生与当事人的情感或情绪相类似的情感或情绪，实际上就是“同感”或“共鸣”。

亚当·斯密认为，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同情或同感总是使双方感到愉快。人总是把同伴或朋友与自己的感情一致看成是最大的赞赏，因而产生愉快；总是把同伴或朋友的情感背离或无动于衷看成是失望，因而引起痛苦。人们把自己的悲哀心情倾诉出来，并且得到别人的同情，就可以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这就是说，同情既可以增加快乐，也可以减轻痛苦。而且，由同情所引起的快乐是双方的。当我们处于一种激起某种感情的环境中时，旁观者的同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而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他的情绪与我们的情绪一致也是愉快的事。由此可见，同情可以成为影响和决定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成为人们的友谊和道德关系的纽带。

亚当·斯密在对“同情”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人们的情感和行为是否合宜的方式。道德家们通常用“公正”来表示行为的性质，而亚当·斯密则用“合宜性”（propriety）来表示行为的性质。亚当·斯密认为，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与旁观者表示同情的的情绪完全一致时，这种原始激情在旁观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与产生这种激情的客观对象



是相称的；相反，当旁观者设身处地发现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与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称。而且，这些原始激情相对于产生感情的客观对象来说的合宜或不合宜，相称或不相称，决定了由它产生的行为是否合宜。因此，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情感或激情的合宜性，就可以了解到这些情感或激情对于激起它的客观对象的合宜程度。对于这一合宜程度，我们只能根据他人的情感与我们设想自己处于相同情况下所感受到的情感的一致性来判断。这种一致性是道德上赞许的情感基础。

然而，在我们设身处地注意到他人的处境时所产生的情绪，与当事人所产生的情绪在程度上往往有所不同，那么，他们如何达到情感的共鸣呢？亚当·斯密认为，为了获得相互同情的愉快，旁观者和当事人双方都做出努力，一方面，旁观者尽可能努力提高他的情绪以达到客观对象真正会产生出的程度，从而尽可能宽容或同情当事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当事人尽可能把自己的情绪降低到旁观者所能赞同的程度，即当事人为了获得旁观者的同情，便在某种程度上压抑并缓和自己的情感，从而防止自己的情感走向极端。在这两种努力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美德：温柔、有礼、和蔼可亲、公正、谦让和宽容仁慈的美德产生于旁观者的同情，而崇高、庄重、自我克制、自我控制和控制各种激情的美德产生于当事人对个人情感的节制。

从亚当·斯密关于如何在相互同情中产生美德的论述，我们可以引申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自利或自爱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约束机制（尽管亚当·斯密本人并没有提出“经济人”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活动中审慎的、自利的人的论述确实包含“经济人”思想）。在亚当·斯密看来，尽管我们每个人心里确实必然宁爱自己而不是别人，但是他不敢在人们面前流露出这种

态度，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按这种原则行事的。由于渴望获得公正的旁观者的同情（这是人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则），他必定会收敛起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同的程度。旁观者也会设身处地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迁就他的自爱之心，允许他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幸福，更热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追求财富、名誉和显赫地位的竞争中，他可以尽其所能和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采取不公正的手段挤掉或打倒对手，旁观者对他的迁就会停止。他们不会同情他那种过分的自爱之心，也不赞成他伤害某个对手的动机，却乐于同情被伤害者的愤恨，而伤人者则成了他们憎恨和愤怒的对象。因此，个人绝不当为了私利而伤害他人的利益，否则必定为世人所唾弃。

由此可见，天然的同情机制制约了人类追名逐利的行为，它一方面使我们同情别人的自利，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别人的同情不得不减弱我们对自己利益的感受，前者使我们如同天生同情自己的利益一样同情别人的利益，不至于损人利己，后者使我们不至于过分自爱，二者共同使我们的逐利行为趋于中和，防止出现破坏性。当然，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复杂的，除自爱和同情外，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还有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它们也对人类的自爱行为起制衡作用。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没有作多少解释，但从他的《道德情操论》的有关论述看，“看不见的手”除利益驱动机制外至少还应包括道德、法律和自然三个层次的约束机制。我们在此无法全面论述经济人的约束机制，但无论如何，道德约束机制应是“看不见的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同情理论与他在《国富论》中对人的利己心的强调并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以“同情”为基本原理，亚当·斯密对其他一系列伦理范畴，如仁慈、正义、良心等，均提出独到的见解。比如，在比较



仁慈与正义这两种德性时，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是正义，而不是仁慈。尽管缺乏仁慈，社会将处于令人不快的状态，但它依然能够维持下去，而一个社会如果不义行为盛行，那么它肯定会被彻底摧毁。正义是支撑社会这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因而，在亚当·斯密看来，制定和维护正义的法律乃是统治者的第一要务。在正义的法律框架下，社会财富自然而然会流向社会各个阶层，这恐怕不需要统治者多虑。但如果缺乏正义，“自然”秩序就会被打破，社会的稳定岌岌可危。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对亚当·斯密的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不能一一论述。



亚当·斯密主要以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赢得了巨大声誉，他在伦理学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在亚当·斯密自己心目中，他的伦理学乃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作为哲学家，亚当·斯密所要建立的是一般的道德哲学体系（亚当·斯密时代的道德哲学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无论是他的经济学还是法学，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其中的应用部分，而其基础部分就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道德心理学和道德哲学。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作者也很快被公认为一流的著作家。亚当·斯密在世时，此书再版五次，在其后的一百年间也多次再版。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对此书大加赞扬，说它见解新颖，是前所未见的“道德理论的最壮丽的大厦”。不管这种评论是否有过誉之

嫌，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此著在当时受到极大的重视。不仅如此，此书后来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是长盛不衰，它不仅被看作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经典，而且该书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对后来的西方美学，特别是悲剧的情感理论，也有重要的影响。康德的崇高理论，经由埃德蒙·伯克，间接地受益于《道德情操论》。

英国近代的经验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从洛克开始，特别是在沙夫茨贝利之后，在同欧洲大陆唯理主义伦理学的论争中，逐渐发展出与唯理主义伦理学相对立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派。情感主义伦理学强调作为人性本质的道德情感，把凌驾于理性之上的仁爱情感同增进人们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幸福联系起来，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的新倾向。情感主义伦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沙夫茨贝利、哈奇森、休谟和亚当·斯密。当然，在亚当·斯密之前，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功利主义思想主要限制在仁爱情感的范围内，并没有把伦理学和经济学贯串起来，没有从经济关系中寻找道德感和伦理原则的根据。正是亚当·斯密把情感主义伦理学进一步推向功利主义。他不仅从道德感、同情心即一般人性上考察道德的本质，而且还从经济关系中考察人的行为和人的情感，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这是西方伦理史上道德思考的重要进展。

英国近代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反对霍布斯、曼德维尔等人强调的自私自利的自爱道德，主张仁慈、仁爱，强调社会义务与人类良心，表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道德倾向。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综观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可以发现，亚当·斯密始终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同感，强调仁慈和正义。在亚当·斯密看来，自爱自保，虽然是人类的原始情感，但并非人性的全部。一个有德之人在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同时，还应该关心他人、同情他人，爱他人如爱自己、爱社会如爱家庭。幸福就存在于与他人的同感之中。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一



个有德之人，要能够“把自己原始的和自私的感情的最完美的要求、最微妙的感受和对别人原始的感情与同感感情连接起来”。总之，在道德问题上，亚当·斯密强调同情、怜悯、相互帮助、相互尊重，既重视个人，又重视集体或他人，这种充满人性色彩和人道精神的伦理观念对于我们在当今时代理解和塑造市场经济中的人性道德，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当然，《道德情操论》原著篇幅浩大，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附带的和历史的研究，与主题关系不紧密。我们本着忠实原著本旨要义、减轻读者阅读负担的原则，以原著为底本，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将原著编译成这本小书，希望能为大家打开一扇通往大师思想的方便之门。限于水平，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杨玉成

